

比较

经典译丛



*Risk and Financial
Arrangement*

风险与金融安排

主编 曹荣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比较”经典译丛

风险与金融安排

Risk and Financial Arrangement

主编 曹荣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风险与金融安排

“比较”经典译丛

主 编 / 曹荣湘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65232637
责任编辑 / 章绍武
责任校对 / 枣 栗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0.75
字 数 / 270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184 - 3 / F · 077
定 价 / 24.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编译局主管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办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组织机构

主 编 吴敬琏 荣敬本 赵人伟

社 长 杨金海

执行主编 孙宽平

副 主 编 杨雪冬

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 任 顾锦屏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 灿	许成钢	李剑阁	张卓元	陆学艺	杜书明	吴晓灵
吴敬琏	胡建森	洪银兴	周小川	周叔莲	赵人伟	郭树清
逢锦聚	荣敬本	徐显明	唐万里	黄建柏	黄范章	程 伟
楼继伟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建堂	王水林	史晋川	吕 炜	吕晓波	迟福林	刘成相
苏 波	李 克	李晓西	张少春	张 新	邹农俭	范恒山
易 纲	林毅夫	周其仁	周茂荣	信春鹰	侯云春	胡鞍钢
姚 刚	俞可平	郭励弘	贾 康	钱颖一	袁纯清	夏 斌
崔之元	黄海洲	谢 平	谢 庚			

编辑部主任 曹荣湘

编 辑 丁开杰 李 连 马玉茹

总 序

荣敬本

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上发表的翻译文章以专题形式结集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正式公开出版以前，吴敬琏、赵人伟和我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曾编辑出版过一本《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论著选辑》，收集了布鲁斯、奥塔·锡克等人的著作。布鲁斯、奥塔·锡克在 1979 年底和 1981 年先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邀请来华讲学，他们都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其中锡克任捷克副总理时主持的经济改革，被说成“布拉格之春”，遭到苏军坦克的镇压。布鲁斯、锡克的讲演，在经济学界和最高决策层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但也有不同意见，其根源还是把市场经济同姓资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有意识地选编了国际上已流行的不再强调“主义”比较法，而强调决策、信息、动力的“体制”比较法，也选编了前苏联批评“市场社会主义”，把它等同于反苏、反共的材料，供大家比较参考。该书临出版前，吴敬琏教授还推荐了一篇科尔奈论短缺经济学的文章（这可能是国内较早发表的一篇科尔奈的文章）。这样，就形成了一本论述不同于前苏联的集中计划体制模式的论著。

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论著选辑》编辑出版过程中，国内正好处于学习高潮，赵人伟教授已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董辅

苌教授、吴敬琏教授和我则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加英语强化训练班。在学校里，我们完全像大学生一样学习。此后，吴敬琏教授还曾到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在此期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论著选辑》发行量有一万多册，成为许多研究生必读的参考书。这种学习对推动中国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起到了一定作用。

1984年底，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吴敬琏、赵人伟教授已先后从国外学习归来，这时，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对改革取向的选择，而是如何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问题。鉴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论著选辑》编辑出版的成功，在中央编译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合作编辑出版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这一刊物。刊物取名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还有一段小故事需要交待。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苌教授从德国访问回来后，曾送给我一本书，即《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所谓经济社会体制，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体制，二是政治体制，三是文化体制，即有关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文化理念。刊物名称即由此而来。刊物的名称意味着我们意识到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会面临许多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刊物发行初期，发表了吴敬琏、赵人伟在出国学习期间收集的比较经济学的最新文献，以及他们在国外结交的许多学者的文章，成为了很好的学习课堂。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我们刊物出版以后第一次编选的文集《腐败：权力和金钱的交换》。当时，针对官倒和腐败风气蔓延，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市场经济的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在体制转轨时很容易发生利用行政权力谋取金钱的现象，这是典型的寻

租行为，是产生腐败的温床。针对这种现象，吴敬琏教授倡议我们刊物召开一次有关寻租理论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受到经济界的好评，林毅夫等推荐了有关寻租的文章，钱颖一还对译文做了校对，还有邹谠教授的博士生曹景钧送给我们一本关于寻租的论文集。这样，我们在杂志上不断刊载有关寻租的文章，最后，由肖梦负责，把有关文章结集出版。这本文集多次再版，影响较大。

关于寻租问题的讨论，不仅使我们更坚定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而且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开拓了新的政治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时，使我们更注意研究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更注意研究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时的制度建设，刊载了大量比较制度分析方面的最新理论文献和研究成果。

此外，亚洲经济发展一直是我们的刊物关注的重点。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始终存在着依存关系，特别是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如何看待亚洲发展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并且关注我们金融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刊载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文章。

我们的杂志从创办起就意识到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创新，但是，也要注意各个子系统的互动关系。如果我们选择的战略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就必须注意社会保障系统的建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达到社会共同繁荣的目的。在这方面，我们杂志也刊载了许多文章和资料。此外，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方面，以及在企业治理方面，我们也刊载了许多文献和资料。

早在刊物创办时，我们就提出了四句话作为刊头语，即“比较开眼界、比较长知识、比较启智慧、比较出真理”。值此我刊出版逾百期之际，回顾我们改革的历程，许多改革方面的创新都是集体学习、集体实践的结果。中央编译局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的翻译机构，我们深深懂得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理论创新。我们编辑此文集的目的，就是为这种集体学习和集体实践提供方便，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设。

2003 年 7 月于北京

导读：金融风险与体制安排

曹荣湘

20 世纪下半时，金融体制问题是经济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全新的问题。在之前，尽管经济界关注过金融危机，关注过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但毕竟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超过了金融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问题被提到了国际经济学的中心；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以及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令世界金融处于强烈的持续的动荡之中，其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完整的经济体。如何健全国内金融体系，以抗拒金融传染；如何设定国际金融体制安排，以降低危机爆发的程度和范围，吸引了全世界理论界的密切关注。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赵人伟和荣敬本等于 1985 年创办。历年来，如何从体制上建立健全国际金融体系和我国金融体系，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关注的理论重点之一。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们就立即组织了一系列由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撰写的专题论文，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理解。近几年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继续关注金融体制问题，陆续向国内翻译引进了许多著名学者的作品。

考虑到读者的需要，为了从整体上展示金融体制建设的方方面面，该刊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将历年来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发表的与金融体制相关的译文选编在一起，共同推

出《风险与金融安排》一书，以飨读者。

全书文章的选择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文章的经典性。本书所选文章均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有些文章尽管发表已久，但其内容是恒新的。二是作者的知名度。麦金农、斯蒂格利茨、小约翰·科菲、格拉泽、尼古拉斯·拉迪、莱斯特·瑟罗、钱颖一、许成钢等等，无一不是学术界的名家。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整体上展示了金融体制的问题，如汇率制度、政府与金融、金融自由化等等；第二部分重点关注证券市场与证券管制；第三部分是金融危机与金融传染的专题；第四部分聚焦中国金融体制的建设。

一 金融制度与体系建设

《东亚美元本位、浮动恐惧和原罪》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的一篇最新力作，一经发表，即在理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该文是一篇关于东亚国家汇率体制的重要作品，重点考察了两个问题。一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汇率制度的现状即高频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二是“日元区”问题。文章认为，亚洲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选择了高频钉住（即以每天或每周为基础的、以较高的频率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因为其金融市场不完善，包括债券市场不完善和远期外汇市场不完善两个方面。该文把国内债券市场不完善称之为“原罪”。金融市场不完善是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恐惧和拒绝，是一种理性行为。

该文还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还在向低频钉住美元（即以每月或每个季度为基础的、以较低频率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发展，这不仅是因为其债券市场不发展和远期外汇市场不完善，因此需要依靠钉住制度来规避金融风险，还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希望以此为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提供

一个名义锚。

近几年在亚洲经济学界，有人力倡建立一个广大的“日元区”，其中尤以日本学者为甚。麦金农的文章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指出，虽然日本是世界第二大工业化国家，虽然日本与亚洲国家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贸易关系，但在东亚地区的一般贸易活动中和亚洲内部的贸易往来中，美元却得到了比日元更为广泛的使用，就连日本的国际贸易也主要以美元计价。2000年，日本向世界出口的52.4%、进口的70.7%，都是用美元计价的。东亚地区过去是，现在是，短期内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美元区。

《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8年在菲律宾“亚洲发展论坛”上的讲话。该文强调了两个重点，一是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二是金融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其基调是为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做辩护。

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学术界历来存在激烈的争论。新自由主义者极力否定政府的作用，认为政府从来是市场的障碍。作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的斯蒂格利茨以亚洲发展为例，认为政府在有效配置资源、完善信息流动、促进市场竞争等方面起着纠正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政府还能完善金融体系，进而如亚洲经济发展所表明的，吸引储蓄、促进投资、管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金融问题，从而为经济在稳定中增长，在增长中稳定提供了重要的机制。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金融体系只是一个附属品，或者是一个被动地将稀缺资源分配到最有效部门的中介。在巨大的国际资金流面前，有人甚至认为金融是虚拟经济。针对这种观点，斯蒂格利茨利用亚洲经济发展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实例，有力地说明了金融对发展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改进金融体系能够导致高增长和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在考虑金融改革时，我们需要将自由化看做一个手段而非目的。我们不应去寻求

立即放松金融管制，而应努力领会政府在金融市场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时至今日，斯蒂格利茨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仍有积极意义。毕竟，金融稳健在金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是在消退，而是在增加。

针对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理论界立即掀起的“全盘否定亚洲模式”的浪潮，斯蒂格利茨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批评。他指出，一方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许多被指责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因素正是当年被夸赞成促进亚洲发展的因素。毕竟，亚洲模式所创造的奇迹不是一句简单的否定就能抹杀的；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并不是亚洲的特产，而恰恰是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仅凭一场危机就否定这种发展模式，显然过于简单化了。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危机中汲取教训，总结其优点，避免其弊病，才能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有利于理论建设。

著名经济学家卡普里奥等所撰写的《金融自由化的利弊》，是一篇对金融自由化进行深入评论的文章。他们认为，金融压抑的兴起是与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相连的。在金融压抑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于是，随着金融业管制的放松，更为广泛的国内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得以实现。但利率自由化经常伴随着危机的爆发或者引发危机。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完全分享经济增长利益的国家来说，建立一个实质性的金融自由化体系是惟一可行的出路。该文对自由化初始阶段将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所需要的条件做了全面阐述和总结。对我们这样一个正处于金融自由化道路上的国家来说，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埃瑞克·伯格洛夫的《转轨经济中的金融制度安排选择》是一篇建设性很强的文章。该文围绕的问题是股票市场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角色，以及作为治理手段的共同基金和商业银行之间的选择问题。在简要概括俄罗斯和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当前形势特征的基础上，区分了“保持距离型”和“控制取向

型”两种金融类型。利用这一基本概念性框架，作者总结了若干经验教训和政策建议，明确表明商业银行在转轨经济中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 证券市场的管制

本书第二部分专门关注证券市场的问题。不管是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国内，证券市场已经变得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但在金融领域，相对于银行业、债券市场来说，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波动性和风险性更大。因此，证券市场的管制和立法显得特别关键。然而，这些管制和立法对市场的影响到底如何、什么样的管制和立法才是适度的和正当的呢？这些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争论焦点。但是，在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小约翰·科菲是国际著名的证券法专家，对美国证券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有很大影响。他的基本立场是赞同管制，而在理论界和政策界有关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激烈争论中，他站在强制披露一边。本书收入的《市场失灵与强制披露制度的经济分析》一文，可谓是信息披露制度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几乎任何一篇研究信息披露制度的文章，都不可避免地要引用它的观点。

对强制披露制度的正当性，小约翰·科菲提出了四点强有力的理由：首先，信息具有公共品的特性，因而证券研究就具有供给不足的趋势。这种不足一方面是发行人信息供给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发行人以外的渠道搜寻重大信息的不足。强制披露制度是一种理想的减少成本战略，它通过对搜寻信息成本的社会补贴来确保信息的数量及信息的准确性。第二，没有强制披露制度将导致更为严重的低效率。由于投资者为追求交易利润，往往分别独立地去搜寻信息，这将造成社会成本的不必要增加。而一种集中信息搜寻机制能减少因经济资源不当配置而造成的社会资

源浪费。第三，“自愿披露”的作用是有限的。认为信息应该自愿披露的理论，忽视了公司控制权交易的重要性，而把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完美合作想得过于容易。事实上，存在一些对管理层的利益引诱，如可折价购买股权、参与内幕交易或杠杆收购。由于这些利益刺激极为诱人，所以管理层就可能通过向市场释放错误信号的方式从中谋利。第四，即便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中，理性投资者仍需要一些信息以优化证券投资组合。这些信息最好由强制披露制度来提供。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证券法律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一文，是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任主席戴维·鲁德尔撰写的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它详细描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运作过程和原则，特别对 SEC 的法庭之友活动做了重点描述。该文对我国相关机构的建设和运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拉泽等人的《科斯对科斯定理——波兰和捷克证券市场规制的比较》一文，则运用科斯定理，对转轨国家特别是波兰和捷克的证券市场规制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所谓科斯定理，是指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任何制度包括依法履行的私人合约、法律规定、政府规制，都可能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因此，当产权界定明晰和交易成本为零时，市场当事人会组织交易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政府通过税收、规制或法规的方式来纠正市场行为。格拉泽等人认为，尽管科斯学派的论证从表面上看是强有力的，然而其所依赖的假设条件中最关键的是有效的依法履行复杂合同的可能性。法官必须能够而且更重要的是愿意去阅读这些复杂的合同，核实特殊条款的约定事实是否真正发生，以及解释笼统、含糊的语言。因此，他们认为，法律实施者所面临的激励机制决定了最优的制度选择。

小约翰·科菲的《证券市场失败的教训：私有化、少数股东权利保护和投资者信心》探讨了证券市场管制与公司治理的关

系。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发现，各国之间在所有权集中度、资本市场的发展、投票权的价值以及利用外部融资等问题上存在制度性差异。而这些差异看起来与对少数股东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力度密切相关。在投资者保护方面，一直存在普通法体系和大陆法体系的差别，前者以英美为代表，后者以法国为代表，前者对投资者的保护远远强于后者。

小约翰·科菲以此为前提，分析了转轨国家如何更稳健地建立投资者保护制度。针对学术界呼吁转轨国家采纳普通法体系的主张，小约翰·科菲从分析没有法律准备的转轨国家试图引入大规模私有化的失误所在入手，建议不要移植特定的学理上的原则，而要优先考虑职能的移植。

三 金融危机与传染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的《亚洲的崩溃及治疗》是较早一篇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完整看法的文章，它主要反思了亚洲新兴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弊端。莱斯特·瑟罗教授是较早预言亚洲经济将出现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最著名的是克鲁格曼）。在该文中，瑟罗从资本主义历次经济危机说起，追溯了投机狂潮、巨额外债、信息不完全的巨大危害。他指出：“环太平洋地区要启动新一轮高速增长，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崩溃之后收拾残局的能力。那些希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国家最终必须意识到，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它们必须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其发展战略应主要依靠国内增长。”这一结论也许正好印证了历史的现实。亚洲金融危机后，许多亚洲国家就采取了拉动内需的战略，并逐步走出危机的阴影。瑟罗当时就预言：“最终，快速复苏的将是这样一些亚洲国家，它们拥有高效的中央政府，有能力扭转由于定值过高的资产价格狂泻而导致的混乱局面，并采取以刺激国内需求为基础的增长战略。而有的国

家将会像过去 7 年中的日本一样，陷于长期的停滞。”

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海洲、许成钢教授的《金融制度、风险扩散和金融危机》专题研究了风险传染问题。他们首先区分了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两种体制。按照他们的说法，前者指金融机构不能中止对差项目的贷款，后者则指能中止对差项目的贷款（我国无疑属于前者）。他们认为，软预算约束综合症不仅影响金融市场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它还扭曲了市场信息，导致银行间贷款市场面临“逆向选择”问题。金融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可能导致银行挤兑风潮，造成银行间贷款市场的崩溃，使所有投资者都陷入惊恐不安的境地。这样，经济危机就可能爆发。相反，当企业面临硬预算约束时，它们定期向银行和金融市场披露商业信息，因而可以防止银行破产，控制危机扩散风险并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

麦金农教授的《协调汇率以度过东亚货币危机》，则从汇率体制上对复苏危机后的亚洲经济提出了很好的政策建议。他认为，东亚国家有必要协调它们之间的汇率政策，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远期汇率（即对未来即期汇率的预期）的协调上。他强调指出中国在亚洲经济复苏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正是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稳定的，中国决心保持总需求水平，而且中国经济的规模巨大，所以，中国是亚洲经济复苏的关键。麦金农的观点受到了历史的印证，而他强调协调汇率的主张，确实富有见地，并且为亚洲国家走出 1997 年的金融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框架。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亚洲各国努力的目标之一。

《从韩国金融危机看国际金融体系的教训及改革》是韩国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金融研究所所长朴英哲对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全面总结。他认为，韩国的金融危机表明，国内借贷者和国外贷款商对危机的爆发显然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IMF 在稳定局面方面没有人们期望的有效。同时，韩国的决策者们对于危机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们对于必要的经济改革处理不当，对金

融部门的管理不善，因而加深了外国投资者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对危机信号没有予以必要的注意，缺乏应付危机的能力，也是政府负有责任的证明。朴英哲还指出，国际金融市场的弊端更加明显，并加剧了危机，使打击面更趋广泛。他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金融一体化的世界中，尽管对国际金融体制的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但需要设计出在危机爆发时能够控制住它们的手段。同时应该允许体制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先在国际金融领域进行尝试，取得一些国际经验，再逐步开放其金融市场。

乔纳丹·泰纳鲍姆的《金融癌症：世界金融和经济秩序总危机》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大量的纯粹的‘虚拟的’金融资产近年来无控制地增长，结合整个世界的真正物质生产的停滞和下降，已经造成近世纪全球性金融崩溃的条件。”是否会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还有待观察，但泰纳鲍姆提出的警告还是应当引起高度注意。

四 转轨中的中国金融体系

众所周知，我国的金融体制在转轨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脆弱性根源。逃过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得益于我们的外汇储备的充足，当然也得益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加上又是大国经济。不过，能逃过并不就意味着我国金融体制的健全，说得严重一点，躲过了这一次，还要面临下一次的考验。毕竟，金融危机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通病，随时可能爆发，而且爆发的频率越来越快，甚至有人认为爆发的强度也越来越大。

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一直长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本书收入的《中国的金融体系何时能满足其需要？》深刻地剖析了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低下，对生产领域和金融部门自身带来了深刻的消极影响，现在的金融改革方案在财政上具有不可持续性，发展商业信用文化十分必